

6.3 参考文献

1. Yamey G, Ogbuoji O, Kennedy McDade K. We need a consensus on the definition of 'global public goods for health'.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8.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18/11/20/we-need-a-consensus-on-the-definition-of-global-public-goods-for-health/> (accessed 28 October 2021).
2. Chalmers H, Faitaki F, Murphy V. Setting research priorities for 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 What do stakeholders want from EAL research? 2021. <https://ealpsp.wordpress.com/2021/09/08/setting-research-priorities-for-english-as-an-additional-language-what-do-stakeholders-want-from-eal-research/> (accessed 30 November 2021).



公民, Maureen Smith 是一位公民领袖, 倡导患者和公民有意义地参与研究并将其用于决策



公民, Hadiqa Bashir 是一位年轻的领袖, 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倡导女童权利和性别平等

作为为证据委员会做出贡献的三位“公民”中的两位,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需要对公民如何参与证据的生产、共享和使用以应对社会挑战提出更高的期望。我们的公民专员Daniel Iberê Alves da Silva将他作为年轻原住民领袖的经验写入了第4.10节(原住民权益和认知方式)。我们需要确保原住民控制他们的数据, 并尊重原住民学习和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这里, Maureen借鉴了她在研究中作为长期“患者合作伙伴”的经验, 以及最近作为COVID-END公民领导者参与COVID-19证据综合的经验。而Hadiqa则借此为她在巴基斯坦的宣传工作提供证据

在 COVID-19大流行期间, 向公民传达证据尤为具有挑战性, 原因有很多:

- 做出了许多关于公共卫生措施、临床管理、卫生系统安排以及经济和社会响应的决策, 并发布了许多指南。随着疫情的发展和证据的积累, 这些决策和指南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调整, 但通常并没有对为什么做出改变提供充分的解释
- 生产了多种形式的证据, 大量证据及参差不齐的质量所产生的“噪音”存在重大的问题, 这往往使得公民质疑他们的决策依赖于哪些证据
- 来自不同群体和环境的公民及公民领袖通常不参与证据的生产和分享, 而由此得到的证据并没有对许多公民产生影响
- 许多新闻和社交媒体平台主动或被动地促成了错误信息的传播(如第4.11节所述)。

我们认为, 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规则水平”, 让公民参与到证据的产生、共享和使用中, 以应对社会挑战。实现这些目标和培养全社会证据文化的关键是, 以公民易于理解和相关的方式了解和获取证据, 以及确定什么是可靠证据的能力。我们已经通过COVID-END证明, 不同的公民群体能够在1到10天的时间内有意义地参与快速证据综合的准备, 每周或每月定期更新动态指南, 以及准备证据综合和指南的简明语言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证据产品可以像研究人员的证据产品一样, 成为公民的证据产品。我们已经看到, 公民领袖是关键的中人, 应该积极参与到社区的证据共享。有人提醒我们, 公民本身就是决策者, 他们的证据需求应该被满足, 就像政府政策制定者的需求得到满足一样。

有意义的公民参与必须支持为解决所有社会挑战而做的努力。这场大流行加剧了一些“影子大流行”, 例如基于性别的暴力、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种族和社会不平等以及更多。如果我们要找到这些社会挑战的根源, 就需要为公民在证据生产过程和政策变革举措中有意义的参与和领导创造空间。

证据委员会对全球委员会进行分析发现, 公民在各项工作中的参与度不高。公民很少成为目标受众、委员会成员和广泛参与的焦点。公民需要公平地参与到前进道路的规划中, 以利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

